

李
谊注释

杜
甫草堂詩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杜甫草堂诗注

李谊注释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成礼
封面设计：张仁华
封面题字：刘云泉

杜甫草堂诗注

李 谊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198 千
1982 年 4 月第一版 198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600 册

书号：10118·518 定价：0.96 元

詩聖杜拾遺像

南軒商竹橋
慕樹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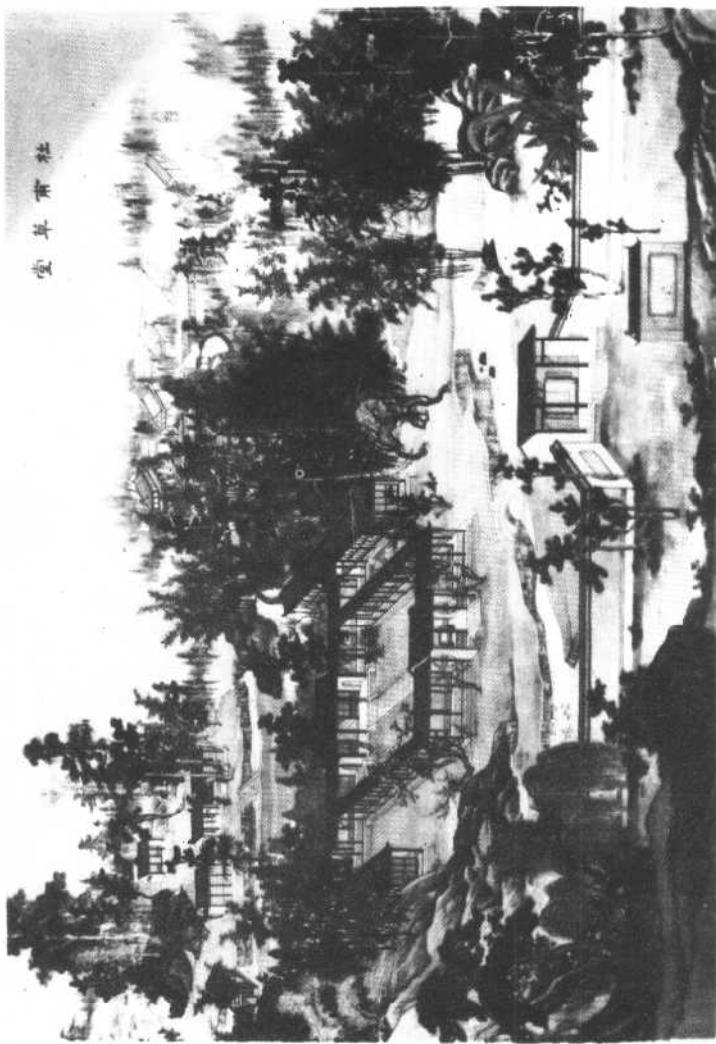
丁巳



句董啟本
張敬陪范培
丁巳

清人刻杜甫像

杜甫草堂示意图（赵蕴玉 绘）



宝库出版社

飯啼門東

赤臂行

玄泰元年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觸赤臂乞園須住
來翠尾金花不辭零江中淘河嚇飛鸞街泥却落羞
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鮑一作莊見敗傷其父老翁
恨莫恤少年葛亮貴和晝夜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
憶細故非高賢

海棕行

實應元年

左綿公館清江瀆海棕一株高高雲龍鱗峯田相錯
落蒼棲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
出帝閣比辰不可得時有西城胡傳謠

玄泰元年

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
书影（现藏杜甫草堂）

前　　言

寓居成都草堂是杜甫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于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岁末到成都，代宗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五月离去，除有一年多避乱梓州和阆州外，实际在草堂住了将近四年。这是他除长安之外住得最久的地方。正如诗人自己所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这里说的五载，是前后搭起来算的。在这些岁月里，杜甫虽然经历了草堂幽居、间或出游、梓阆流寓、重返成都、入幕任职、辞归草堂和离蜀东下等曲折过程，但总的来说还是比他一生中任何时期安定。他在草堂时期的诗作二百七十一首（内含他间或出游蜀州、新津、青城、绵州和重返成都途中所作的诗二十三首），将近占他流传至今的一千四百多首诗的百分之二十。这些诗也同他的其它作品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他所能接触到的民间疾苦，表现了诗人的社会经历和生活情趣。如果说杜甫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起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重大作用的话，那末他在草堂时期的诗篇则是使他整个诗歌创作达到艺术高峰的过渡阶段。后世诗论家对杜甫入蜀后的诗作都极为称道。明代胡应麟说：凡诗“惟中岁工力并

到，神情俱茂，兴象谐合之际，极可嘉赏。如老杜之入蜀，……皆篇篇合作，语语当行。”（《诗薮》续编卷二）清代黄子云也说：“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亦不少，……至入蜀后，方臻圣域。”（《野鸿诗的》二四款）杜甫在草堂的诗作同他的其它作品相比较还独具特色：

首先，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杜甫一生饱经忧患，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的政治腐朽、社会疮痍和民间疾苦，从而对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国家的命运有着诚挚的关心。他一生贯穿着从未衰竭过的政治热情。诗人寓居成都的几年，国家正处于内乱未已，外患加甚的严重局面。他在成都草堂所作的二百多首诗，咏诵范围极为广泛，诸如蜀中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民间习俗，山川景物，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犷无理的恶少，无拘无束的山人，热情纯朴的农父，顽皮天真的村童等等，都无不织入他的诗篇。其中，书怀、寄赠各占六十多首，感时近五十首，咏物四十首，抒情、登临、题画、酬和等共六十多首。在这几类诗篇中，匡正时弊、针砭痼疾、反映社会政治等重大内容的占大多数。而且有不少是思想性、人民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桔》、《枯棕》、《赠花卿》、《野望》、《忆昔二首》、《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等，诗中充满了感时伤乱的崇高感情，表现了对维护国家统一、平定分裂叛乱的深切关心，寄予了诗人自身羁旅哀愁、怀古伤今的无限感慨。南宋楼钥曾经指出：“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忠义感慨，忧世愤激，

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攻媿集》卷六十六）因此可以认为，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篇，仍是留下时代痕迹的“诗史”。

其次，对各种诗体的运用，也于继承中有创辟之功。为了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杜甫不仅善于继承优良传统，而且大胆革新，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加以发展、创新。过去许多诗人，往往只擅长某种诗体。杜甫则各体皆会，又体兼众妙，做到了“诸体皆有妙绝者”。杜甫是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他的《石筍行》、《石犀行》、《赤霄行》、《莫相疑行》等，都是此时的代表作。这种“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乐府诗，打破了“沿袭古题，重复唱和”的旧有格式，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和反映现实提供了一种更方便、更直接的形式，开了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张籍等人的新乐府运动的先河。杜甫的五、七言古诗，驰骋笔力，极其变化，拓为千言，亦诗亦史，铺陈叙事，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取得了以诗叙事的杰出艺术成就。故刘熙载认为：“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艺概》卷二）他的《成都府》、《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草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律诗中七律是唐代的新兴诗体，杜甫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大量的创作实践使七言律诗发扬光大，成为尔后文学艺术宝库中光彩照人、瑰丽雄奇的诗篇。黄子云说：杜甫“七律则上下千百年无伦比。其意之精密，法之变化，句之沈雄，字之

整练，气之浩瀚，神之摇曳，非一时笔舌所能罄。”（《野鸿诗的》十八款）。他在草堂作了七言律诗三十四首，象《蜀相》、《登楼》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他也作了大量的五言律诗，仅草堂时期就有一〇四首，《为农》、《遣兴》、《后游》、《春夜喜雨》等是其代表作。杜甫的五、七言绝句，是他入蜀以后才创作的作品。草堂诗中绝句诗达六十五首，占他全部绝句诗一百三十八首的一半左右，并以写景抒怀为多，描写细致，刻画精巧，还常以诗代笺，庄谐兼备，其风趣不亚于晋人书帖。清人称他“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总之，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已熟练地掌握各种诗体并且业已达到了灵活运用和随心所欲的地步。

第三，在诗歌风格方面，也有较大的变化。杜诗富于变化，为人们交口称誉。他的诗歌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挫为主，这为后世所公认。清人陈廷焯就称“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白雨斋诗话》卷八）杜甫在成都草堂期间的诗歌，也是风格多样而且变化颇大，既有千锤百炼之作，又有随意挥洒之篇。他从秦州流亡成都，本想过安静生活，刚到不久也写过一些意境幽静、情趣闲适、调子轻松的作品，如《卜居》、《堂成》、《狂夫》等。其风格情调，同他前一阶段描写处于战乱之中的人民所受苦难的哀愁凄切，刻画自己拖儿带女、颠沛流离的作品相比，令人有判若霄壤之感。杜甫在草堂的诗，似乎变得百琢千镂、细腻刻画、深远洒脱了；但是他在浣花溪畔的恬静生

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他“计拙无衣食，穷途仗友生”（《客夜》），始终在贫困中挣扎，长期处在“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的状态中。接踵而来的又是段子璋、徐知道相继为乱，他曾避乱梓阆，往来奔走，穷愁潦倒，一年多的时间回不了草堂，过着无可奈何、随寓而安的飘泊生涯。故沉郁怆凉并兼有衰飒哀愁的诗风，也就显露出来。不久，严武重来镇蜀，杜甫放弃了离蜀东下的原定计划而重返成都，还被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成为严武的幕僚。开始，诗人心情有意外的愉快，“殊方又喜故人来”（《奉待严大夫》），要“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时过不久，他就感到：“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了，次年正月辞去幕职，复归草堂。四月严武病故，杜甫便于五月永远离开了成都。诗人在重返草堂一年多的岁月里，虽然曾有过昙花一现似的欢愉，但更多的境遇是：生计困窘、疾病缠身、幕府束缚、同僚猜嫉、故旧凋零，以及垂暮飘泊。他这段时间的诗作是伤时感世者多，清新欢快者少，其诗风是平静中有悲凉，抑郁里含沉痛。杜甫整个草堂时期的诗基本上是以比较轻松豁达的情调开始，而以悲凉沉郁的风格告终。这就为他在夔州及以后的诗歌发展成极其突出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作好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第四，认真学习民歌，从中吸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杜甫草堂诗一个十分明显的特色，就是笔调清新、语言精炼、格调新颖、民歌气息浓厚。在语言、情调以及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等各个方面，杜甫不仅向古代乐府民歌学习，而且还受到蜀中民歌民谣的深刻影响。正如诗人自己后来所说：“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草屋新赁五首》），“竹枝歌未好，画船莫退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巖二首》）。他非常喜爱蜀地民歌中的所谓“巴渝曲”和竹枝歌谣，并从中吸取养分，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生命力。他在这一时期所作的《绝句漫兴九首》、《寒食》、《春水生二绝》、《戏作花卿歌》、《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大麦行》、《草堂》等，都是受民歌影响而写成的代表作。王嗣奭评价《绝句漫兴九首》时指出：“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杜臆》卷之四）。李东阳也称“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见《怀麓堂诗话》）。吴可更举出了杜集中同竹枝词相似的篇章，认为“老杜诗云：‘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线即买系篱旁。’与竹枝相似，盖即以俗为雅”（见《藏海诗话》）。这充分说明，杜甫在草堂时期曾以极大的兴趣，大胆尝试用活生生的民歌情调和民间语言来改造六朝和初唐以来只图华丽浮艳而又僵化过时的诗歌情调及语言。诗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功绩。就连在遣词用语上，诗人也深受民歌的影响。杜诗中诸如“幸不”、“若为”、“应须”、“熟知”、“打著”、“何当”、“不如”、“何忍”、“斩新”、“叫妇”之类的口语俗话，真是俯拾皆是。杜甫学习民歌语言，以俗语方言入诗的作法，显然是对诗歌语言的大胆革新。这就使他的诗作语言精

炼，笔调清新，诗风质朴，为中国古典诗歌在语言上的通俗化开拓了新路，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超越同时代诗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元稹曾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元氏长庆集》卷十八）。而运用“当时语”这一显著特色，在成都草堂及以后的诗篇中，较之他的前期作品就更加明显、突出。

最后，联篇组诗的数量也大为增加。诗歌中除古体诗便于叙事、容量较大外，近体诗都受着字数、格律、对仗等的限制。要以字数有限的诗篇来反映繁富的客观景物和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单首的诗确实难以胜任，这就需要联篇组诗。杜甫来成都以后，组诗的数量大大增加。在他所作的二百七十多首诗中组诗为八十多首，将近占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共作联篇诗章二十六组，占杜集中全部组诗的五分之一，相当于成都之前全部组诗的总和。这些联篇诗作中有两三首联成一组的，也有五六首联成一组的，最多的是九首联成一组。象《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江头五咏》、《戏为六绝句》、《春日江村五首》等都是此时的代表作。他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表现了联篇绝句诗的特色，每首都在写花，因花的具体地位不同，“历一境，换一意”（吴瞻泰《杜诗提要》卷十四），花的姿态和寻花人的精神也就殊异。诗中既写了景，传了神，也抒了情。“每首寻花，章法各能变化。”（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之十）所以刘须溪认为：这组诗“每诵数过，可歌可舞，使老人复少。”（杨伦《杜诗镜铨》卷八注引）综观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所作的组诗，无论是叙事、议论，或者是写景、抒

情，都是一气贯珠，首尾衔接，而又各各成篇。这就有效地发挥了组诗的作用，克服了单首诗篇容纳内容不多的局限。尤其以他议论入诗的篇章，就更加做到了联篇吟咏，迭唱不衰。这对后世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但是，他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诗人，不可能摆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同情人民却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更多地从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出发，因此总是把完成统一大业和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身上。表现在诗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忠君思想和封建意识。在成都草堂所作的一些诗篇里，还流露出消极隐退、与世无争的情绪。在诗歌风格上，往往沉郁顿挫中带着怆凉萧飒。在感情上，更多的是忧郁沉重。这些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批判。

为了继承杜甫留给后世的这份珍贵遗产，满足广大杜诗爱好者阅读和欣赏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诗作的要求，特把他在草堂所作的全部诗篇按写诗的时间顺序，即以编年的体例，原则上采取每两句进行通俗解释和浅注的方法而成为这本通俗读物。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些诗篇的解释和浅注有助于了解杜甫在成都期间的思想变化、生活情况等，从而使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为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服务。

在注释杜甫的这些诗篇时，曾经碰到有的诗写作年代、作诗地点以及内容解释等在清代的几种主要注本中都存在异说。本书系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依据，并参照浦起龙《读杜心

解》、杨伦《杜诗镜铨》、钱谦益《钱注杜诗》诸本以及王嗣奭《杜臆》和曹树铭《杜臆增校》与《杜集丛校》等书，或者择善而从，或者姑存其说。还参考了不少当代专家的杜诗选本和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专著，并采用了其中若干研究成果。

在注释过程中，曾得到《四川群众文艺》编辑部陈德外同志的大力帮助，谨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杜诗内容的博大精深和本人学识水平的限制，加之时间又很仓促，错误和缺点仍在所难免，殷切期望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专家、学者和所有本书读者的批评指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李 涛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于杜甫草堂

目 录

前 言	1
成都府	1
酬高使君相赠	3
卜 居	4
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賛	6
肖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7
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	8
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	8
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9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10
诣徐卿觅果栽	10
堂 成	11
蜀 相	12
梅 雨	14
为 农	15
有 客	16

宾 至	17
狂 夫	18
田 舍	19
江 村	20
江 涨	21
野 老	22
云 山	23
遣 兴	24
遣 愁	25
杜鹃行	26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28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29
戏为韦偃双松图歌	31
北 邻	33
南 邻	34
过南邻朱山人水亭	35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36
奉简高三十五使君	36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37
赠蜀僧闾丘师兄	38
泛 溪	41
出 郭	43
恨 别	44
散愁二首	45